

语言理论探索

论文集

徐志民
著



文匯出版社

語言理論探索

論文集

徐志民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言理论探索/徐志民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 5

(出海口诗文库. 第3辑/吴欢章、刘希涛主编)

ISBN 978-7-80676-905-8

I. 语... II. ①徐... ②吴... ③刘... III. 文学语言-文集 IV. H04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33970号

语 言 理 论 探 索

徐志民 著

责任编辑/甘 棠 特约编辑/望 波 装帧设计/王永银、倪丽丽

出版发行/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铁路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字数/214千 印张/9

ISBN 978-7-80676-905-8 定价:28.00元

目 录

CONTENTS

目 录

总序/吴欢章	001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	001
索绪尔研究的新阶段	017
索绪尔在中国	039
洪堡特语言理论说略	049
评洪堡特的汉语观	057
关于拉法格的《革命前后的法国语言》	073
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述评	084
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	101
马丁内及其语言理论	118
游顺钊与视觉语言学	127
西方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	135
欧美语言学论著简介（四则）	148
语义学的历史和现状	152
语义单位的确定和定名问题	165
词义关系研究述评	179
褒贬词能组成同义词吗	190
关于词的感情色彩的几个问题	194
歇后语与隐喻	202
评《实用汉语课本》	205
《今日汉语》编写中的几个问题	212

中国的语义研究：1976-1996	218
《视觉语言学论集》译编后记	226
《实用语义学》序	229
《欧美语言学简史》后记	231
《欧美语言学简史》修订附记	233
《欧美语义学导论》后记	234
 附录：译文三篇	
从认知角度探讨上古汉语名量词的起源	235
汉语律诗的模式格局	244
论语言中的时间指向问题	254
 后 记	266

因为这个字形实际上是用伸展双臂来表示体积的宽大的。同样的道理，𠂔（腰）这一字形，实际上包含着双手在胸腹之间标出腰部这一动态。双手置于两边，只是整个动作结束后的静态形状。又如，甲骨文的尸（左）、𠂔（右）两字，他不同意一些人认为这是对左、右手的静态刻画的想法，而认为这是先民造字时按动态的指示手势所作的忠实描写。这就是说，尸字表示手指尖端指向的一边是左，相反，𠂔字则表示尖端指向的一边是右。他觉得中国古文字研究因受传统的书法欣赏的影响，重视汉字的静态美，因而忽略了汉字构成上的动态因素。在词汇方面，他发现表达时间概念的词语大多来自表达空间-视觉的词语，并提出从认知层次来看，无形的时间感知是依附于有形的具体空间-视觉事件来体现的。类似这样的分析，在他的论著中不少。他的这种强调动态分析，要求揭示一般死抱着静态分析法无法看到的隐藏在“静”后面的“动”的见解，确实很富有启发性，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充分证明了他提出的视觉语言学的解释力，以及他将时空概念和“动态”意识引进语言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意义。正因为这样，他常常能提出一些人们不大注意或意想不到的东西，从而使我们对某些语言现象获得了新的解释，或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这正是近年来他的研究工作越来越引起学术界重视的原因。

至少就目前来说，游顺钊所掌握的“离群”聋人创造的手语材料，无论就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材料，来之不易，是他在近十年时间里奔波于欧、亚、美三洲所做的脚踏实地的调查工作的结果。在这方面，他继承了前辈语言学家注重“田野工作”的优良传统，又比前辈学者更进了一步。为了仔细观察手势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情况，获取最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他坚持背着沉重的电子仪器，住到所调查的“离群”聋人家中。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面，要这些聋人乐于接受，另一方面，他也必须适应生活上的许多困境。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搜集到了迄今最完整的自然手语材料，仅比蒂贵和郝家这两种最有创造性的手语，他所收集到的手势就各有1200个左右。由于他跟聋朋友及其周围人

的深入交往，他们最后把不少涉及私生活和家庭纠纷的禁忌手势都自愿告诉了他。由此可见，就是在研究工作的态度和方法方面，游顺钊也有他独特之处，这也是他之所以能在视觉语言学的研究中作出令人瞩目的成就的不可忽略的方面。

前不久，游顺钊完成了国家博士(博士后的最高学位)论文。这一题为《‘离群’聋人手语的创造》(création des langues gestuelles chez des sourds isolés)的长篇著作，打印稿有950页，荟萃了他在视觉语言学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所搜集的最珍贵的资料。这一出色的研究专著，在1988年6月9日举行的论文答辩会上，获得了评审委员会的最高评语。学术界也普遍给予好评，不少同行学者向他借阅打印稿，先睹为快，好些外地学者写信向他索取论文。

由于游顺钊的工作，目前视觉语言学在法国已逐渐为大多数语言学家所接受。以往，不少语言学家强调手语不是语言，因而不重视，现在从游顺钊的研究中发现，手语与口语确实存在着一系列平行现象，手语(尤其是自然手语)的资料不仅可以，而且完全应当引入到语言学的研究中来。过去，关于中国古文字的研究，在法国汉学界和其他许多地方，大多仅限于语文学的范围，主要为考证文献服务。游顺钊则不同，他着重从视觉角度挖掘中国古文字的静态书写系统中所隐藏的、可用来论证语言问题的原始痕迹，他的研究是属于语言学范围的，这无疑拓宽了文字研究的视野。总之，视觉语言学在探索语言共性、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起源、语言发展规律等问题上的意义，已为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所感受到。当然，游顺钊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于开创阶段。他自己也说，他所提出的一些假设涉及的范围有限。例如关于基本手势序和词序的共性，主要涉及基本陈述的序列，并不能解释口语和手语中后起的词序和手势序，也不能解释词序和手势序的多样性。他所提出的某些见解，也不无可商榷之处。不少论题则有待作进一步的探索，其中包括他对语言起源问题所提出的一个大胆假设。他在1986年于英国牛津大学举行的语言起源问题讨论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模式手势与引导句法——语言创造上的一个突破》。在这篇文章中，基

于对自然手语手势类型及其创造过程的分析，他提出了“语言起源于手势”的看法，这一理论当然尚需认真讨论。不过，视觉语言学既已开创，相信今后将会不断充实，在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在国家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游顺钊曾说，他很像一名跳高运动员，明知人的跳高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但总是不断企图跨越新的高度。事实确是如此，执着的追求，踏实地实践，刻意创新，正是他的性格特征，我们期待着他在视觉语言学的探索中取得更为可喜的成果。

（原载《国外语言学》1989年第2期）

西方语言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

—

人文主义(humanism),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同基督教神权相对立的、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文化与精神。人文主义于14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兴起,15、16世纪发展到欧洲各国,在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的许多学术领域都有人文主义的传统,语言学科也不例外。近年来,一些研究西方语言学说史的论著在论及关于语言与思维和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时,常常提到“洪堡特思想”,似乎认为它就是西方人文主义语言研究的源头。这种看法自然不无道理,然而却不全面,因为早在洪堡特之前,已有不少学者像洪堡特那样以人文主义的眼光考察语言现象了。^①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西方哲学就十分关注思维与语言的关系问题。早期学者大多认为逻辑的思维方式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思维方式,语言则是依赖并从属于逻辑思维的,因此常常以逻辑的眼光看待语言问题。最早起来向这种逻辑主义语言观提出挑战的,是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A. Dante, 1265-1321)。但丁虽然认为中世纪的宗教语言拉丁语是完美的语言,但已不再相信表现日常感情世界和写诗歌也非用拉丁语不可。他写了《论俗语》等论文,为民族语言辩护,并带头用意大利语的托斯堪方言写了《新生》、《神曲》等不朽诗篇。但丁之后常常出现通俗语与拉丁语之争。主张采用通俗语言写作者,都认为通俗语言更能表达

^① 参阅 T.de Mauro, *Une introduction à la sémantique*, Payot, Paris 1969. p.51.

当代人的思想感情，由此引出了每种语言都有自身的特点的想法。这一想法随着各民族语言之间接触的增多和语言视野的扩展不断加强。英国学者弗兰西斯·培根(F. Bacon, 1561-1626)已察觉到世界的语言存在着许多差别，这些差别不只限于语言形式方面，而且关系到词的构成与句子结构。他并且提出了语言差别跟民族特性相关的看法。英国哲学家洛克(J. Locke, 1632-1704)在其《人类理解论》(1690)中提出关于人类认识的新观念时，批判了语言天赋观念，同时也批判了语言逻辑主义。在该书第三卷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探讨中，他特别关注语言的多样性和语言的独特的历史面貌。他指出：“一种语言有许多文字，在别种语言中并找不到其相应的文字。这就分明指示出，一国中人可以因其风俗习惯之所需，而形成一些复杂的观念并且给它们以各种名称，而在别的国家，则从不把这些观念集合为一个物种观念。”^①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G. Vico, 1668-1744)在其经验主义的研究中，也从新的视角对语言进行了思考。维柯指出，语言是人们得以以确切而完整的方式提出思想史、宗教史和法津史等等的基础。因此，在《新科学》(1725)里他做了大量的语言分析，尤其是词源探索工作，努力通过语言这一最重要、最可靠的见证来理解和解释过去的现实，特别是民族的历史。在揭示语言研究的人文视角方面值得一提的另一位学者，是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 W. Leibniz, 1646—1716)。他在《人类理智新论》(1704年完稿，1765年出版)中重新考察了洛克所探索过的一系列语言问题。他认为，每一种语言都走着自身的道路，各种语言不仅在语音方面，而且主要是在句法和语义方面有着自己特殊的面貌，远非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似乎各种语言均是相同的普遍概念和范畴结构的记录，只是表面的语言形式有别而已。莱布尼茨曾提出过一整套搜集和比较各种具体语言的设想，

^①洛克《人类理解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15—416页。

并努力付之实施。莱布尼茨关心的，主要也是各种语言的具体的历史特性这一层面。

由此可见，自文艺复兴时期起，直至 18 世纪上半叶，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逻辑主义相对立，始终存在着一种语言人文主义的倾向。除了上面列举的数人之外，法国的卢梭、孔迪亚克等人的语言观也是属于这一倾向的。这些学者在不断深入地探索语言历史特性的过程中，努力寻求语言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路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某些学者的论述中，仍留有明显的理性主义的残余。例如，维柯希望通过不同语言的分析，证明不同的民族之间存往着一种共同的、有普遍价值的“心头词源”。在《新科学》中他曾提到：“我们在本科学第一版里曾设想编出一种‘心头词源’（Mental Dictionary）来对各种发音不同的语言找出意义，使它们在实质上显示思想（观念）方面的某种一致性，这些大体上一致的观念由于考虑的观点或角度不同，各种不同语言中就采用不同的词表达出来了。”^①莱布尼茨所说的“语言是人类心灵最好的镜子”^②也包含着类似的想法。尽管这种理性主义的观点在这些学者的思想中已不占主导地位，但也足以说明，人文主义的语言理论在这一阶段里尚处于逐步形成的过程中。

二

西方人文主义的语言理论是在浪漫主义时代的德国成熟起来的。18 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出现了一种新人文主义思潮，其内容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深广得多。在语言研究方面，是由德国的一些浪漫主义者继承了人文主义的传统，与浪漫主义思潮汇合在一起，从而使语言人文主义思想得到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

^①维柯《新科学》，第 20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年。

^②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第 373 页，商务印书馆，1982。

新时期的德国语言人文主义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被卡西尔称为“历史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家”^①的赫尔德(J. G. Herder, 1744—1803)。赫尔德著有《论语言的起源》一书。在该书中,赫尔德以他对人性的理想以及对人类文化的特征及发展的深刻直观为根据,阐述了对语言的本性和起源的看法。在他看来,语言不是一件物体,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寻出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原因的物理事物。它是一种过程,是人类心灵的一种一般功能。^②他认为,语言与思维是共同产生、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他说:“一个民族怎样思维,就怎样说话,反之亦然,怎样说话就怎样思维。”^③由此,他又提出,语言不只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形式和仓库,在语言里沉积了一代代人的经验和知识。在探索语言本性的过程中,赫尔德提出过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如,“德国人的语言与他们的思维方式相一致的程度究竟如何”,“为了证实德语具有的特征的奥秘就在于它是民族的镜子,……我们可以通过德国人特有的(语言)映象作怎么样的解释”,等等^④。由此,他引出了一个新论题,即:民族的语言形成使用该语言的民族成员的世界映象。这一新论题的提出,无疑进一步拓宽了语言研究的人文视角。正如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布雷阿尔(M. Bréal)所指出的:“循着莱布尼茨(他具有如许正确而深刻的看法)的方向,赫尔德让德国人不再把语言视为单纯用作交流思想的工具。他清楚地指出,对于善于观察的人来说,语言会提供关于民族的生活和感知方式的最原始最可靠的证据。”^⑤赫尔德的有些观点,虽然早先已有人提出过,但由于他强调民族语言的个性与民族思

^①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②同上。

^③转引自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7页。

^④A. Schaff, *Langage et connaissance*, Éditions Anthropos, 1974, p. 19-20.

^⑤见M. Bréal为F. Bopp的“Grammaire comparée des langues indo-européennes”法译本所写的序言,1966, Vol. p. V III.

想、民族文化的联系，颇有新意，而且与当时的浪漫主义气氛特别相适应，因此很有影响。

德国新人文主义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是洪堡特(W. Humboldt, 1767—1835)。洪堡特既是政治理论家、历史哲学家、美学家，又是语言哲学的先驱。在语言研究领域，他可以说是语言人文主义传统的集大成者。他吸收了上几个世纪语言人文主义研究的不少观点，尤其是继承了赫尔德的许多论点，经过加工和发展，从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人文主义语言哲学。洪堡特跟赫尔德一样，认为具有创造力的母语在形成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他比赫尔德更加强调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他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式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人们的任何想象。”^①对赫尔德提出的“民族语言形成一种世界形象”的论点，洪堡特也完全赞同，而且大加发挥，明确提出了“语言世界观”的论题。他认为，由于“每一个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②，因而每个人都要受到母语世界观的束缚。他还提出，“语言的区别不是声音和符号的区别，而是世界观本身的区别。这里包含了一切语言研究的理由和最终目的”^③。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是与他认为语言具有“改造”功能的看法紧密相联的。他认为，语言并不只是被用于交流认识，它还在认识过程中进行加工，把混沌的现实世界“改造”成为有序的语言世界。此外，洪堡特提出的“语言内部形式”概念也与“语言世界观”概念密切相关。尽管他对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从未作过明确的说明，但他的“语言内部形式”显然跟他所说的民族语言所反映的民族独特能力的蕴涵是有内在联系的。由于洪堡特

^①见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第39页。

^②同上书，第45页。

^③转引自《国外语言学》1987年第4期，第151页。

的语言人文主义思想有深厚的哲学基础,而且他曾尽力通过对一些语言的语法的比较具体地揭示过某些语言的思想与文化内涵,因此对后来的学者影响特别深远。这也正是当前许多研究者在谈到语言与民族和文化的关系时通常把“洪堡特思想”视为理论根源的主要原因。

三

20 世纪,西方的语言人文主义思想和人文研究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致说来,有欧、美两种模式。在欧陆语言学界,主要由德国的一批新洪堡特主义者继承了赫尔德、洪堡特的传统。新洪堡特主义者的语言“场论”(Feldlehre),是在索绪尔的语言共时系统和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这两种理论的双重影响下诞生的。“场”概念由伊普森(G. Ipsen)于 1924 年首次引入语言学。他说,一个整体限定语义场的范围,而语义场本身又分成一个个小部分,犹如一块马赛克(mosaik)的拼图,词跟词连在一起,每个词有各自的轮廓,但又彼此相连。^①特里尔(J. Trier)对“场论”作过深入的探索。他说,“场是介乎于单词和词汇整体之间的活生生的语言事实”^②,语言符号只有在“场”内才有意义,“只有当我们把一个词的意思跟相毗邻的和相对立的词的意义区别开来时,我们才能理解这个词的真实意义。只有作为一个整体的部分时才有意义,因为意义只属于场的范围”^③。他还认为,研究语言场就是研究语言的内部形式,确定了一个场的区分,就使我们看清了语言世界形象的一部分,因此对语言场现象的研究,必然会导致对语言所包含的世界的发现。新洪堡特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魏斯格贝尔(L. Weisgerber)的“精神中间世

^① 见 A. Schaff, *Langage et connaissance*, P. 31.

^②转引自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年,第 329 页。

^③见 A. Schaff, *Langage et connaissance*, P. 30.

界”理论，则是直接由洪堡特的思想引伸出来的。他说：“语言之所以是精神的构成力量，是因为它从现实世界和人的精神的前提中形成思维的中间世界，在这一中间世界的精神‘现实’中反映出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在这里我们谈的是把现实世界‘改造’成‘精神财富’，这一‘改造’从洪堡(特)那时起，就被看作是语言存在的唯一基础，这一‘改造’的结果表现在具体语言的世界观中。”^①在另一部著作中，他说得更为具体：“只有通过一个精神的中间层次，音响形式才与表现丰富的‘事’和‘物’相遇。这时音响形式无疑属于语言(且总是属于一种母语)。我们把‘事’和‘物’归于外界(自然界，物质文明)。但是这两个范畴是不能直接相遇的，必须始终顾及到一个精神中间世界。在它中间本质上所出现的是‘思维形象’。正是这种中间世界才有可能使音响形式为一方，‘事’和‘物’为另一方而得以连接。”^②由此可见，魏斯格贝尔的“精神中间世界”是由位于语言符号(词语)内容平面的“思维形象”构成的。在那儿，现实世界被“改造”成了精神“现实”，从而形成了一个“精神中间世界”。他认为，正是这种由语言形成的“精神中间世界”反映了各种语言独特的世界观。新洪堡特主义者不仅发展了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理论，使之具体化，而且对德语词汇做了许多实际分析工作。例如，魏斯格贝尔为了揭示德语中的“世界图景”，曾详细描写、分析过德语的星象名称和动植物词语。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成果汇集于特里尔的《智能领域中的德语词汇》(1931)、魏斯格贝尔的《论德语的力量》(1949/1950)等专著中。由于他们不只停留于理论上的讨论，而且提供了广泛而饶有趣味的语言材料，因此很引人注目。

差不多同一时期(本世纪30—40年代)，在美洲也出现了一种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的语言学思想，那就是萨丕尔—沃尔

^①转引自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29页。

^②转引自赵世开主编《国外语言学概述》，第353-354页。

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萨丕尔、沃尔夫提出他们的假说，主要基于两点认识：一是认为语言是一种确定的系统，会影响人们感知周围世界的方式，二是由此认为，由于各种语言系统有明显的差别，因而人们所感知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两点与新洪堡特主义者的看法完全相吻合。不过，看来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与洪堡特的理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继承关系。这一假说是在人类语言学研究中通过经验材料的综合、推理而提出来的。美洲人类语言学的开创者鲍阿斯(F. Baos)早就指出，“语言的特殊性质明显地反映了世界上各种人的观点和习俗”^①。萨丕尔的语言理论更加明显地显示出具有人文主义的性质。他认为语言有“启发功能”，“语言是认识社会现实的指南”。他说：“真实世界是在该族人的语言规范的基础上不知不觉地建立起来的，……我们这样或那样地看到、听到和感知到某种现象，主要是由于我们社会的语言的规范预先规定了一定的表达形式”^②。由此他认为，“使用不同语言的各社会成员所生活的世界是多种多样的许多个世界，而不是具有不同标志的一个同样的世界”^③。沃尔夫是萨丕尔的学生。通过对河比语(Hopi)等印第安语言的分析，及对印第安语与所谓欧洲一般标准语(SAE)的比较，他进一步发展了萨丕尔的思想，从而形成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这一假说主要包含“语言相对论”和“语言决定论”这两层意思。前者认为人们对现实的感知及其思维方式受语言形式的影响。沃尔夫认为，“任何人都没有自由来完全不偏不倚地描述自然，即使在他认为自己是最自由的时候，他也是被迫采取了某些方式的解释。……这样，我们就被导致一个新的相对论原理，这个原理认为：同一个物理证据，并不使所有的观察者都得到相同的宇宙图像，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是类似的或者能够以某种方式互相校

^①引自赵世开《美国语言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页。

^②见《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2期，第9页。

^③同上书，第10页。

定的”^①。后一层意思则干脆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沃尔夫说道：“每种语言的体系(换言之，语法)不只是思想声音化了的传达工具，准确地说，它本身就是思想的创造者，是人类个体理性活动的纲领与指南。”^②他还认为，使用截然不同的语法的人，他们被自己的语法结构强制着对外表相同的事物进行各种不同的观察，作各种不同的评价，由此形成对世界的观点各不相同。^③“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跟新洪堡特主义者的理论，趋向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具体语言材料的分析方面有不同：魏斯格贝尔、特里尔限于分析词汇、词义，沃尔夫则侧重于不同语言的语法范畴的分析与比较。例如，沃尔夫认为河比语的时空概念与欧洲语言是不一样的，这是由它们的语言结构、语法范畴的不同造成的。他以此证明语法范畴对人的认识与思维方式的决定作用。“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产生之后，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尽管至今众说纷纭，但它仍然不失为当代理论语言学中最具吸引力的论题之一。

四

通过上面的简述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人文主义研究开始得很早，并且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西方语言人文主义的研究究竟提出了哪些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呢？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些什么启示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下述几点。

首先，对语言人文性的揭示，展现了语言研究的新视角，拓宽了研究领域，并有助于人们更全面地把握语言的本质。很早以来，人们就认识到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和交际的工具。语言的工具性是语言的本质特征，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语言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工具性并不是它的唯一特性。语言作为一种符号

^①转引自沙夫《语义学引论》，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2页。

^②转引自兹维金采夫《普通语言学纲要》第338页。

^③同上书，第339页。